

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区寺院经济研究

——基于出土西夏文契约文书的考察

孔祥辉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黑水城地区出土了一批西夏时期的经济文书,其中存有西夏天庆甲寅年(1194)正月至二月间,当地同一寺院与附近农户签订的契约文书,内容包括粮食借贷、土地买卖及牲畜租赁等。通过文书内容分析,笔者认为西夏后期,黑水城周边已形成寺院为主导的农村市场。在被主导的市场中,农民与寺院在土地、牲畜交易中地位极不平等,并受到寺院经济剥削。同时,僧俗之间经济关系失衡造成当地农村权力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及水资源争夺。加之十二世纪后半期气候变迁,本区域内自然条件不断恶化,兼具多重角色的寺院深刻地影响了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

【关键词】黑水城西夏文契约文书;农村市场;寺院经济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3-0058-09

Research on Monastery Economy in Heishui Area in Late Tangut Dynast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Unearthed Tangut Contract Documents

KONG Xiang-h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Abstract: A number of Tangut economic documents in the Tangut period were unearthed in Heishui City, including the contract documents signed by the local temples and nearby farmers during the Tangut Tianqing Jiayin Year(1194)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of the Lunar Calendar, which included food lending, land sales and livestock leasing, et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the late Tangut Dynasty, the rural market dominated by the temple had been formed around the Pudu Temple in Heishui City. In the market that was dominated, the peasants were treated extremely unequally in economic transactions with the temple such as in that of the monastic land, and were economically exploited by the temples. Meanwhile, the imbalance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ks and the lay people caused the local power balance in the rural area to be broken, mainly in land annexation and competition for water resources. Coupled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2th century, the natural conditions in this region had been deteriorating. The temples with multiple role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rural economic society in Heishui City in the late Tangut Dynasty.

Key words: Tangut documents of Heishui City ; the rural market; temple economy

受客观所限,学界对西夏时期的经济社会研究进展甚缓。因史料匮乏,先贤们只能从浩若烟海的汉

【收稿日期】 2018-12-21

【基金项目】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天盛律令》整理研究”(17ZDA186)

【作者简介】 孔祥辉(1994-),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西夏历史与文献。

文史料中搜罗出零星资料。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天墀、漆侠、乔幼梅等前辈利用有限的汉文资料对此课题进行了论述并构建了基本框架^①。二十世纪末,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公开,为西夏经济社会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且珍贵的史料,尤其是黑水城地区出土的12世纪西夏社会文书,包括户籍、军抄、赋税等,是当时社会活动的生动写照。其中诸多西夏文经济文书,更是研究西夏黑水城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材料。本世纪初,史金波、杜建录等先生利用西夏文法典《天盛律令》及诸多已释读的社会文书,对西夏经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厘清了许多西夏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②。此外,在西夏契约文书研究方面,陈国灿首先对15件汉文典当契约文书进行研究^③,而后孙寿龄介绍了一件武威出土的西夏粮食借贷文书^④。上述研究仅针对西夏时期的汉文契约文书,而西夏文契约文书还未被学界广泛研究利用,尤其是众多的西夏文草书文书,艰深难懂,大多数学者只能望而却步。关于西夏文契约文书研究之现状,罗海山在《国内西夏文契约文书研究评述及展望(1980-2015)》中已有说明,不再赘述^⑤。

近年来,西夏文草书文献不断释读,其中的经济文书亦成为研究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重要史料。经过长期译释,史金波在《西夏经济文书研究》中对这些原始文献进行了系统录释,其中就包括已释读的西夏天庆甲寅年文书^⑥。是书对契约文书种类、形制性质、签署画押、契约双方身份、违约等基本情况做了介绍,并指出西夏后期土地兼并严重,黑水城寺庙趁粮荒之机,参与了剥削贫困百姓的高利贷活动。崔红芬^⑦、骆详译^⑧、安北江^⑨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上述文书进行了关注。上述研究虽提及到天庆甲寅年普渡寺文书,但就此时本区域内农村经济关系的变化尚未探讨。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西夏黑水城农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尚未进行系统研究,在西夏晚期的经济社会方面着墨较少,仅有赵天英对编号为7741和5870的两组文书进行专门研究。笔者通过分析以黑水城寺庙—普渡寺为中心的经济文书,对西夏晚期本区域内农村经济及社会进行典型例证研究。利用僧俗间的土地交易与债权债务等基本要素,对此地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等内容进行系统阐述,重塑寺院在当地经济中的多重角色。

一、天庆甲寅年契约文书概况

经统计,目前该书中刊布且释读的西夏天庆甲寅年契约文书共32件^⑩,其中贷粮契包括 ИНВ.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漆侠、乔幼梅:《辽夏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陈国灿:《西夏天盛典当残契的复原》,《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原件见[法]马伯乐:《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伦敦,1953年。

④ 孙寿龄:《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国文物报》1993年第5期。

⑤ 罗海山:《国内西夏契约文书研究评述与展望(1980-2015)》,《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⑥ 具体参见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史金波:《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简论》,《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2004年。史金波:《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⑦ 崔红芬:《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⑧ 骆详译:《从天盛律令看西夏荒地产权制度的流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

⑨ 安北江:《西夏寺院经济研究述论》,《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⑩ 原件参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册,第279-280页;第14册,第188-191页;第14册,第56-61页;第14册,第250-252页。本文使用史金波录释及译文。

No.7741、^①ИHB.No.5870^②、ИHB.No.4762-6; 卖地、租借、牲畜契等混杂于ИHB.No.5124。为方便下文说明, 现将各文书内容简要著录于此。

(一) 牲畜买卖及租赁契

文件编号	出售人	买畜人	买畜数量	价值	时间
5124-3(6)	尼积力仁有 及梁铁盛	梁喇嘛	二牛? 生用及一牛黑 齿俱	三石五斗麦及一石 二斗杂	二月三日
5124-4(4)	梁盛犬	梁喇嘛	齿俱骆驼母及马一	价二石麦三石杂	二月三日
5124-4(5)	平尚讹山	梁喇嘛	二竖骆驼公一	二石大麦一石糜	二月三日
文件编号	雇畜人	出租人	数量	租金	时间
5124-4(5)	平尚讹山	梁那征茂梁喇嘛	马? 母	一石四斗麦及一石八斗杂	二月三日
5124-4(5)	梁盛犬	梁那征茂梁喇嘛	二竖骆驼公一	一石八斗杂	二月三日

说明: 录文中存“?”表明该字在原文中不能辨识, 下文同。

(二) 粮食借贷契

文件编号	借贷者	借贷人	利息	借贷数量	借贷时间
4762-6-1	梁功铁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十石麦十石大麦	正月二十九日
4762-6-2	吉祥子引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四石麦四石杂一石粟	正月二十九日
	梁羌德犬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三石麦三石杂一石粟	正月二十九日
7741-1	什或狗盛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二石麦二石大麦一石糜	正月二十九日
7741-2	梁老房乐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十石杂五石麦	正月二十九日
7741-3	嵬移氏女虎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三石麦七石杂	正月二十九日
5870-1	讹利禅势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十石麦四石谷	二月一日
5870-2	梁酉狗白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六石杂一石麦一石粟	二月一日
5870-3	梁氏二盛乐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八石杂	二月一日
5870-4	梁五月宝	梁喇嘛	一月一斗二升	二石三斗五升麦	二月一日

(三) 土地租赁契

文件编号	租地人	出租人	租赁数量	利息	时间
5124-2(2)	苏老房子	梁喇嘛	熟生二十石撒处地一块 院宅院舍	十石五斗麦及五石杂	正月二十四
5124-3(3)	梁老房势	梁喇嘛	十五石撒处地	六石杂及四石二斗麦	正月二十九日
5124-3(5)	梁老房西	梁喇嘛	八石撒处地	二石八斗麦及三石六斗杂	正月二十九日
5124-3(8)	梁老房茂	梁喇嘛	?	三石六斗杂及一石四斗麦	二月一日
5124-3(2)	麻则羌移盛	梁喇嘛	租地数量不明	七石麦十二石杂	二月一日
5124-4(1、2)	梁老房茂	梁喇嘛	五石撒处地	二石八斗麦及五石四斗杂	二月二日
5124-4(3)	梁势乐茂	梁喇嘛	五石撒处地	七斗麦及三石六斗杂	二月二日
5124-4(7)	梁小善麻	梁喇嘛	一石杂地一块	二石杂	二月六日

① 7741号西夏文草文书契, 有学者专作释意研究。参见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② 同上。参见赵天英:《俄藏黑水城文献No.5870西夏文草书借贷契》,《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

(四)土地买卖契

文件编号	卖地人	买地人	数量	价值	时间
5124-2	邱娱犬	梁喇嘛	熟生二十石撒处	杂十五石麦十五石	正月二十四
5124-1	梁老房酉	梁喇嘛	十五(石)撒处地及房屋并树石	六石麦及十石杂	正月二十九日
5124-3(4、5)	恧恧显令盛	梁喇嘛	八石撒处地一块、二间房活树五棵	四石麦及六石杂	正月二十九日
5124-3(6、7)	梁势乐酉	梁喇嘛	熟生十石撒处地房舍墙	二石麦二石糜 四石谷	二月一日
5124-3(1)	庆现罗成	梁喇嘛	熟生十石撒处地一块及房屋大树石笆门五梘分树园	十五石麦十石杂 十石糜	二月一日
5124-3 (2、3)、 5124-4(1)	梁势乐娱	梁喇嘛	五石撒处地	四石麦及九石杂	二月二日
5124-4(2、3)	每乃宣主	梁喇嘛	五石撒处地	五石六杂及一石麦	二月二日
5124-4(6)	平尚岁岁有	梁喇嘛	熟生三石撒四间老院	五石杂	二月六日

在五类文书中,立契时间皆为1194年正月至二月间,共涉及到同一地区数十户几十人,且借贷群体呈现出同姓亲属之间相互担保借贷及非血缘亲属参与其中的现象^①。其中粮食借贷文书内容显示,农户在二月左右借贷,同年八月一日还贷,贷期为半年,月利息为20%,至还贷日时利息已达120%,远高于政府规定的民间借贷利息^②。存留文书还表明,1194年正月到二月间,梁喇嘛所在的黑水城普渡寺共购入生熟地撒76石种子地(约合760西夏亩),向周围农民租出撒78石种子地,借出282石9斗5升粮食^③。不仅如此,寺院还涉及牲畜买卖及租赁等其他方面,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

关于借贷双方的身份问题,上述学者已有研究^④。需要强调的是“梁”为俗家姓氏,后跟“喇嘛”一词表示身份,并无出家人的名号,梁那正茂更是世俗姓名,在寺院里出现二人令人费解。敦煌地区出土的一些僧俗文书中出现了“百姓僧”一词,那梁那正茂是否为当地寺院道场的世俗喇嘛尚需别论。^⑤尽管称呼不同,他们所充当的寺院“经纪人”角色却是毋庸置疑的。

二、寺院集市与财富积累

中古时期的城镇发展尚未成型,西北地区农村集镇与中原地区也不相同,虽然研究西夏时期黑水城农村市场无直接材料,但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以5-10世纪的敦煌社会文书为基础,对同属干旱区的敦煌

① 郝振宇:《西夏民间契约参与人的群体关系特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② 历代以来,民间利息高于官方实属平常,但1149-1169年期间颁布的西夏法令规定:“全国诸人放官私钱、粮食本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及一斛收利一斛以下……不准比其增加”,其规定最高利率不超过100%,参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③ 以下所有计量单位,皆为西夏时期计量单位,与唐宋度量衡制略有不同,具体参见史金波:《西夏度量衡刍议》,《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其中田亩数以撒种子多少来衡量。

④ 史金波先生认为,文书中寺院为粮食所有者,梁喇嘛与梁那征茂为出借的经手者。参见:《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4页。

⑤ “百姓僧”一词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中提出的,参见[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页下注。敦煌文献见P.3155《唐天复四年(904)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农村市场问题进行了研究,其认为“从北魏到唐代,佛教很明显的扮演了大拓殖者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土地贫瘠和干旱的地区……”^①。大量的敦煌世俗文书表明,早在10世纪,敦煌地区即存在大量以寺庙为中心的农村集市。国内关于寺院经济研究的学者也提到唐代寺院经济中“商业经营”及“商店”的概念^②。在对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藏区寺院、高僧以寺庙为据点,常常在寺院附近组织集市贸易并收取商税”^③。无独有偶,在出土的黑水城文献中亦发现大量僧俗之间的经济文书,大而论之,作为典型农业所抛弃的贫瘠土地,西夏时期黑水城也应该存在诸多以寺院为中心的农村集市。目前尚无法确认普渡寺的具体位置,通过卖地契约中田地的四至^④,我们也仅能认为它应该是黑水城水渠网络附近的一座寺庙,这也基本符合谢和耐对敦煌地区寺院地理位置的判断^⑤。因契约文书中出现“𡇗𡇗” (喇嘛)一词,与西夏时期僧人称呼“𡇗𡇗”不同,故史金波先生考证其极有可能为一座藏传佛教寺庙。

集市在物物交换的时代为农民交换生活及劳动用品提供了固定场所,并活跃了村落内部的经济交流。前文已述,同年八月一月半年租期到后,履约的借户理应向寺院上缴各种粮食与其他经济作物^⑥,届时周边农户亦会在秋收的集市中交换所需的生活物品。此外,敦煌地区的寺院破历表明,每年正月、二月、七月和十二月,寺院都会在其附近组织大型的集会,这类集会在西夏,还可能包括佛祖及帝后的诞辰。宗教节日促成的集会和集市的相似性使市场交易向有利于寺院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本区域内的寺院经济有力地控制着农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的寺院在发挥其宗教功能的同时,还汇集了当地的商业和手工业,成为特定区域内的市场中心。

本区域内经济基础薄弱,受自然因素制约,如遇灾年,农牧业经济必会受到很大影响。在此情况下,寺院的集市职能则显得愈发重要。受灾的农民为谋来年生计,在每年正月过后春耕之前,与寺院之间围绕生产、生活物资进行诸多经济活动。此时,寺院也在集市交易中逐渐完成了产业积累,尤其是当农村经济受损或农民破产时,这种产业积累的速度更快。西夏天庆甲寅年经济文书表明,普渡寺作为本区域农村市场的主体,通过一定的资本进行商业活动,在活跃区域内经济的同时完成了财富的积累。^⑦不仅是生活物品交换与土地租赁,畜物的买卖和交换也是寺院集市中的主要活动。黑水城经济以农牧业为主,牲畜作为重要的力畜和交通工具,在农村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天庆甲寅年卖畜契约中,农户在卖地同时将自家牲畜出售,而在几天后签署的牲畜租赁契中,部分农户向寺院承包土地的同时还向其租借大牲畜做耕地之用,这些牲畜不仅是寺院向农户收购的,还有一部分本就属寺院“常住”财产。黑水城辽阔的半沙漠地带,正是官私畜群天然的放牧场所,寺院利用荒地之便,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畜群。故寺院经济不仅控制着土地买卖和租赁的市场,还影响着牲畜交易和租赁。

黑水城地处内陆,农业作物皆为一年一熟,农户于春耕之前卖地,无非换取口粮及春种之原因,但部分农民在卖地契上画押后,随即在高额租金的租赁土地契约上签字,身份从国家自耕农变成寺院支配下的佃农。在古代,底层社会发生粮食饥荒本属平常,但为维持生计,农户只能通过卖地换取口粮,高额的租金与低廉的收购加速了当地农民的破产,故寺院主导下的市场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土地兼并。西夏时

①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② 具体参见陶圣希:《唐代寺院经济概说》,收入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册;黄梅枝:《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1年版。

③ 杨惠玲:《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发展的原因》,《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86页。

④ 天庆甲寅年卖地契约文书皆留存有所卖田地的四周,以此来确定范围。契约中西夏文一般写作“𡇗𡇗𡇗𡇗𡇗𡇗”,译为“四至界上已令明”。

⑤ 其认为寺院常常建筑在水浇田中间出现的荒芜的岛状地带,参见[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⑥ 关于此地农作物的种类,参见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⑦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期实行“计亩输赋”，普渡寺作为新地所有者要向国家交纳赋税，《天盛律令》规定：“诸人互相买租地时，卖者地名中注销，买者谓我求自己名下注册，则当告转运司注册，买者当依租役草法为之”^①。因西夏经济文书资料有限，我们尚不清楚寺院田庄赋税的具体数额。游彪先生在讨论宋代寺院经济时指出：“到了宋代，政府基本上将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等量奇观，特别是北宋中叶以后，寺院、僧人的赋役负担大大加重，这种趋势到南宋时期愈发明显”^②。崔红芬亦直接指出西夏时期僧人承担的赋役和劳务是比较繁重的^③。可以看出此时政府对于寺院的控制已有加强，在经济上尤甚。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存留契约文书显示，普渡寺纳税即便与普通地户赋税相同，与高额的租金和利息相比也就不值一提了。自唐宋以来就有不少寺庙利用社会影响逃避赋税，这与整个社会的宗教信仰也有很大原因。西夏时期，社会各阶层崇佛信佛，在历次的佛教仪轨中，寺院都能通过官方法事及民众的宗教服务（如超度）获得丰厚的捐助和布施。存留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发愿文记载：“夏天庆三年（1196），太后罗氏为于仁宗皇帝忌辰三周年举行大型法事活动，仅布施的生羊就有七万七百七十九口”^④。黑水城普渡寺是否受到政府通过法事活动的支持尚不清楚，但因它在当地的私人宗教活动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我们认为私人宗教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寺院经济的发展。契约文书表明，普渡寺在本地经济中扮演了“商店”的角色，通过集市交易和宗教手段控制了当地市场，迫使附近信众在契约交易中承受高额利息，形成以土地出租为基础、兼营钱粮借贷的地主经济运行模式，并此过程中完成了财富积累。

三、自然条件恶化与农村经济枯竭

高息的粮食借贷和迫于生计进行的土地买卖，正是农村经济枯竭的重要表现。西夏天庆元年，黑水城普渡寺周边农户以极低的价格向寺庙出售房屋和土地，并承受高额利息进行粮食借贷和土地承包。其根本原因在于本区域内其他市场主体无力与寺院经济争夺，继而使寺院经济占据市场主导，高利贷资本乘虚而入。西夏时期，地处西北内陆的黑水城，各民族杂居，以农牧业为主，而农牧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尤其是水资源密切相关。黑水城地处黑河流域下游，虽属内流灌溉区，但自古以来就是旱灾的多发地带。王天顺在《西夏地理研究》中例举了西夏时期有文献记载的旱灾，并指出严重的干旱灾害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西夏社会的发展^⑤。近年来随着西北地区数千年来气候变迁研究逐渐深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世纪时期太阳黑子活动以1171年为界，以后进入相对的干旱季。^⑥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认为12世纪后期，中亚正经历历史上的温暖期，气候变迁对一些绿洲上的农业社会造成很大影响。^⑦

本区域内自然气候虽无直接文献记录，但从同时期宋金两朝的文献中，我们找到了1193年前后（两个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我国天气旱涝变化异常的史料。《金史》载：“明昌元年（1190）五月，不雨，祈于北郊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09页。

②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③ 崔红芬：《西夏寺院僧人赋役问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26页。

④ 聂鸿音：《西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6-178页。

⑤ 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93-95页。

⑥ 刘浩龙、戴君虎、闫军辉、何凡能、葛全胜、牟重行：《基于杭州偏晚终雪记录的南宋（1131-1270年）气候再推断》，《地理学报》，2017年第3期。

⑦ [德]沃尔夫刚·贝林格著，史军译：《气候的文明史从冰川时代到气候变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张德二：《历史记录的西北环境变化与农业开发》，《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5年第2期；梁有叶、张德二：《我国西部地区过去2000年降水变化研究主要进展》，《气象科技》2004年，第3期；张彦虎：《13世纪西域绿洲农业经济的先发展、成就与成因——基于非平衡生态理论的视角》，《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

及太庙,壬戌,祈雨于社稷,己巳,复祈雨于太庙,丙子,以祈雨,望祭狄镇海瀆于北郊”^①,在正史中同一月份内多次记载求雨的信息,可见其情况之严重。明昌二年(1191)载:“诏诸郡复置文宣王庙、风雨师、社稷神坛”。明昌三年(1192)更甚。时“四月祈雨于社稷,丙寅,以旱灾,下诏责躬,丁卯,复以祈雨;五月,祈雨于社稷”^②。在北方经历大旱时,南方则旱涝无常。《宋史》记:“绍熙二年(1191),二月,大雨雪;九月,壬子,以久雨,决系囚,释杖以下,是岁,资、简、普、荣四州及富顺军旱”^③。“绍熙四年(1193),八月,振江东、浙西、淮西旱伤贫民,十一月,辛未,日中有黑子”^④。宋金两国灾害频发,旱灾尤甚,且有台风、地震灾害记录,文献资料证实,在1193年前后,我国内陆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当时的各个政权。

黑水城是地处干旱区的半农半牧区,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一经破坏,自我修复能力很差。虽西夏政府一直鼓励开垦荒地,但区域内常年干旱少雨,除河水灌溉土地,多数地区受水资源制约,人、地、水三者的矛盾愈加激烈,这也使农村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同出黑水城的水税账目文书也说明,即使水源充足,耕地用户还要向政府缴纳水税,这更成为租地农户的负担。近年来,已有学者利用科学方法对黑水城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⑤。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通过地理信息技术及文献记录研究认为,西夏时期黑水城流域大约有人口12万,而元代初期锐减至5万^⑥。其研究人口估算虽存在一定误差,但黑水城附近耕地规模及人类活动遗迹减少确为事实。这也说明在西夏后期至元代初期,本区域内的灌溉农业急剧衰退,常年干旱灾害造成农、畜业减产甚至绝收,依靠自然经济支撑的农村社会受到极大破坏。即使黑水城人均占地数量较多^⑦,但是很多农户的日常生活只能靠借贷来维持,在一次大的旱灾后,农民的土地往往无人耕种,寺院便趁机攫取了这些土地成为新地的地主。以上材料可见,天庆甲寅年之前,水资源缺乏使本区域内农牧业经济受到旱灾的极大破坏,部分农民终在1193年甚至更早开始破产并于1194年初春向寺院借贷。

四、世俗权力失衡与高利贷剥削

寺院不仅在世俗社会中有不小的经济权利,而且往往通过宗教的外衣进行经济活动,对周边信众的影响也扩展到经济领域。史金波先生参考其他契约文书对天庆甲寅年卖地、卖畜契价格进行了对比。总体上,此区域内农民卖地卖畜价格偏低而租赁借贷等价格偏高,说明寺院经济已经打破了此地乡村结构的权力平衡,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主导交易市场。契约文书反映,土地及牲畜愈发集中在以寺庙为主的大地主中,故在发生大规模的粮荒时,出现了半年为120%的借贷利息,而农民卖地价格仅为每亩2斗杂粮上下^⑧。天庆初年,寺院大规模兼并土地,反映出仁孝后期,黑水城附近农村地区因长期的人文与环境影响,生产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农民不得不通过借贷经济维持日常生活。

① [元]脱脱等:《金史》卷9,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15页。

② [元]脱脱等:《金史》卷9,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226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3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02页。

④ [元]脱脱等:《宋史》卷36,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707页。

⑤ 具体参见李并成:《河西走廊的开发》,《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日]佐藤贵保:《隋唐至西夏时代的黑河流域》,载[日]中尾正义编:《オアシス地域の歴史と環境—黒河が語るヒトと自然の2000年》,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1年。

⑥ 史志林、汪桂生、颜耀文:《西夏元时期黑河流域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第83页。

⑦ 西夏政府鼓励开垦荒地,史金波先生分析地账文书也认为黑水城地广人稀,故其人均耕地面积较之中原地区为多。

⑧ 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8页。

西夏后期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恶化严重的影响了黑河下游的经济与社会。作为典型的灌溉农业区域,水源是保证土地的收成的必要条件。经济权力的失衡更体现在世俗社会中各方对黑水城水资源的争夺上,而水资源争夺背后亦是经济能力的较量。尤其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利用资金对工程的组织、人力、畜力的使用成为出家人的功绩”^①,在普渡寺周边,唯有寺院和官府有资金和能力整治渠道和其他公共设施,这又使得寺院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天庆甲寅年卖地契中标明了每块耕地的四至^②。图中显示靠近灌溉渠的大部分水浇地已经被官府和寺院兼并,尤其是寺院趁机通过粮食购地,步步蚕食为数不多且靠近水渠的土地,致使本区域内绝大部分的水浇地成为官地和寺院占有的土地。所谓的官地,主要指西夏皇室、农田司及农牧主所占有的土地,且《天盛律令》中明确规定:“官私地界当分离,不能相互调换”^③。经过寺院的土地兼并,普通农户因种种原因,退出了对水浇地的争夺。土地是寺院、僧侣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也是寺院经济最主要的来源^④,正是因为如此,普渡寺在农民受灾之际千方百计的占有土地,对本区域内农村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土地兼并及高利贷盛行致使农村经济衰弱,普通农户已很难承担西夏政府的赋税。西夏时期的土地赋税,多承袭唐宋,根据土地质量好坏收税,且每亩增收定额的庸草。而人头税也有固定数额,即成丁3斗,幼儿1.5斗。史金波先生通过黑水城作物亩产及与同时期宋代赋役租税比较发现,此时人头税明显高于土地税,^⑤这对黑水城地区的农民而言无疑是沉重的负担。除以上两种税,黑水城还出土部分水税文书,说明此地灌溉区的农田需承担水税,这同时也是水资源紧张的另一个表现。以出土5124-12、13号卖地契约文书为例,农户梁势乐卖撒五石种子地,获得收入六石杂麦一石麦,假设该户一家4口,2成丁1幼丁,仅人头税就要缴纳9斗,而卖地后若无其他经济来源,以后生活显然无力维持,更无力承担赋税的重压。

事实上,这类土地交易中的宗教因素成为寺院和僧伽拥有的优势,这种优势又使寺院在与普通农户收购土地的竞争中措置裕如。寺院通过宗教手段对农户的经济剥削比普通地主更加严重,被剥削者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还要背负思想的罪孽。宗教债务的特殊性就在于,如果不能偿还这些债物,佛法会让他们在来世进入地狱或投胎恶鬼,这种观念在信众中广泛流传。因此,高额的利息也往往被佛祖的“代言人”解释为来世的福报,现世的苦难被视为来世的修行。本区域内的农业经济遭到周期性的自然灾害破坏后,借贷经济对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影响程度更深。

政策的倾斜更加大了失衡的程度。寺院经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是政府颇为重视的问题。在政策上,同时期的宋朝为防止土地兼并而禁止寺院、道观购田^⑥,从已发现的法律文书来看,西夏并无此类的限制律条。实际上,不管西夏与宋朝,帝后臣民多信奉佛教,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向寺院捐助田产、实物也不在少数,使寺院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天盛律令》载:“僧人、道士、诸大小臣僚等,因公索求农田司所属耕地及寺院中地、节亲主所属地等,诸人买时,自买日始一年之内当告转运司,于地册上注册,依法为租役草事”^⑦,法律内容要求寺院购地时需注册纳赋。从已经发现的普渡寺文书来看,土地买卖类的契约文书确实有当地买卖税院的朱印,表明政府已经征收土地买卖税,除此之外西夏并未对寺院经济做出过多限制,说明政策从侧面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

①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② 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72页。

③ 史金波、聂鸿音、黄振华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98页。

④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⑤ 史金波:《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八月庚子条,中华书局,2017年,第2632页。

⑦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96页。

五、余 论

1193年,在位近五十余年的西夏仁宗仁孝皇帝驾崩,同年,桓宗纯佑继位并于次年改元天庆。此时,西夏虽渡过“任得敬分国”危机,但上层社会的政治斗争却愈演愈烈,新皇帝与罗太后矛盾加剧直接导致镇夷郡王安全废纯佑自立。外交上,西夏与金不断交恶,双方互相争夺,致使国力疲敝。时御史中丞言“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轻歌夜宴,舌结口拊”^①,国家内忧外患,危机不断。

佛教对中古时期西夏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帝后臣民信佛、崇佛,统治者利用其思想进行精神统治,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经济体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纽带作用,当寺院与政府结合时,它成为国家管理的有效补充。即底层民众本就贫瘠的财富已经积聚到地主、寺院手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保证了国家赋税收入,这对于西夏晚期的社会经济是及其重要的。赵天英在对7741号文书作专门研究时也指出“在发生灾荒时,它缓和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使灾民不至于变为流民或饿殍”^②。对国家而言,受天灾的农民没有变成令其头疼的流民,对民众而言,虽然承受经济剥削,但至少还有一点生存和落脚的空间,这在古代社会也是很不容易的。正如著名学者何兹全先生所说,“宋代的寺院经济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性质已经不同,用行话来说,宋代的寺院经济是地主经济而不是领主经济。”^③这一变化,也符合西夏时期寺院经济发展的趋势,即寺院在某些地区,成为地主经济的补充。这种经济体的冲击和扩张带来的社会影响同样深远,经济职能与宗教职能结合的寺院主导了农村市场,寺院经济商业化趋势下进行的土地兼并也给当时底层民众的社会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西夏晚期,频发的天灾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农村经济衰弱使寺院高利贷剥削日甚,普通农户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担和赋税压力。出土的天庆甲寅年西夏文契约文书表明,此区域受旱灾影响,造成大量农户破产,寺院经济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和牲畜,并以此为基础主导了当地的交易和借贷市场,普通农户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混乱,甚至在高额的经济压力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中生计无存。本区域内,大量自耕农开始变卖耕地并因生存压力被迫承受高额租金耕种寺院土地,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开始萎缩,这种现象,在上述文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也是西夏晚期,本区域内经济社会良性发展被破坏的一大标志。此时北方的蒙古开始崛起,并在1205年开始频繁对西夏及黑水城进行军事掠夺,二十一年后,蒙古攻破黑水城,西夏随即灭亡。

[参 考 文 献]

- [1] 史金波.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卖地契研究[J]. 历史研究, 2012, (2).
- [2] 安北江. 西夏寺院经济研究述论[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2016, (5).
- [3] 赵天英.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7, (2).
- [4] 郝振宇. 西夏民间契约参与人的群体关系特点[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8, (1).
- [5] 史金波. 西夏经济文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6] 史金波. 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J]. 历史研究, 2005, (1).
- [7] 游彪. 宋代寺院经济史稿[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3.

①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90页。

② 赵天英:《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草书借贷契约长卷(7741号)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8页。

③ 此为何兹全先生为《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一书所作之序,参见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部分。